



TALK WITH CHINESE
JURISTS

[第四卷]

倾听来自朱榄叶、陈治东、王全弟、吴汉东、陈忠林、怀效锋、张文显、姜明安、王晨光、李浩、张湘兰、林亚刚、沈国明、杨立新、王曦、丁凌华、陈德敏、史际春、段匡、曾华群、朱力宇、王树义、刘建宏、冯亚东、傅廷中、余劲松、林喆等法学家的声音……

中国法学家 访谈录

何勤华 /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013069451

K825.19

14

V4

- 上海市人文社科基地华东政法大学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项目
- 国家重点学科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科建设项目



TALK WITH CHINESE
JURISTS

[第四卷]

中国法学家 访谈录



何勤华/主编



北航

C1676963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K825.19
14
V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法学家访谈录. 第4卷/何勤华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301-22481-6

I. ①中… II. ①何… III. ①法学家-访问记-中国-现代 IV. ①K825.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92269 号

书 名: 中国法学家访谈录(第四卷)

著作责任者: 何勤华 主编

责任编辑: 徐 音 王业龙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2481-6/D·332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la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7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39.75 印张 714 千字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前言

在法律史研究(当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也包括整个历史学研究)中,大体包括四种方法:文本解读、社会考证、民族调查和当事人访谈。

文本解读方法的优点是可以不受时间的限制,即我们生活在当代的人,可以通过流传下来的文本研究数百年或数千年之前的法律制度。其缺点则是容易忽视文本之外的研究史料,或者说容易忽视文本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运用、贯彻)。

社会考证方法的内容比文本解读要丰富复杂得多,包括历史上留下来的活动遗迹、考古出土的文物、国家正式文本之外的文献资料等。这种方法的优点除了研究不受时间的限制之外,研究的结论会更加符合社会生活多元化的原貌,更加接近当时事物的真实状态,也比文本解读更为丰富多彩。其缺点是受考古出土成就的大小、历史保留古迹的多少、资料分散零碎状况等的限制,而且史料的来源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偶然性。

民族调查,即对某些具有“活化石”特征的民族(种族)作田野、社会考察。这种方法的优点很明显,因为对于现代人来说,在文本文献、考古资料、保留下来的遗迹都极为不充分的情况下,要对人类早期社会进行复原研究,利用这种还保留了原始社会生活习惯的种族群体进行考察、比较、研究,是唯一可行、有效的方法。但这种方法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即这种“活化石”特征的民族数量有限,大量的民族在近代化的浪潮中,已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了现代社会。而且,即使找到了这样的民族,对这种民族的典型性、这种民族中保留的“活化石”特征中的制度和习惯的代表性与普遍性等,也都是需要非常谨慎地进行分析、鉴别的。

当事人访谈,即对亲身经历或接触过历史上的事件、人物和文献的当事人进行采访,通过其回忆描述,再现以往社会生活的原貌。这种方法,虽然有许多缺点,如当事人可能因年代久远而记忆不清,或记错事实,或可能因某种不便说出口的原因而故意隐瞒、歪曲乃至伪造某些事实,或因许多当事人还健在而无

法完全真实地叙述一些事实,等等。但这种方法的优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研究离我们生活的时代还不远的一些人和事时,曾经亲身经历过、接触过当时的事件、人物和文献的那些当事人,比保留下来的文本文献和其他资料,要更为真实可靠一些。因此,这种方法也是中外史学家们广泛采用的方法。众多传记、回忆录的出版,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笔者认为,在这种访谈、回忆得到其他相关资料印证的前提下,当事人访谈应是研究历史尤其是研究现代史、当代史的重要方法。^①

《中国法学家访谈录》是当代史作品。在上述四种史学研究方法中,第四方法是最为适合本书的编写目的的。因此,在新中国法学发展史研究成为上海市人文社科基地华东政法大学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院建设和国家重点学科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后,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方法。当然,采用这个方法的另一个考虑是,亲身经历、接触过对中国现代法律史和法学史的发展影响深远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60年代至70年代中叶中国发生的那些法律事件、运动的法学家,已经越来越少了。所以,为了抢救新中国法律、法学发展的活的史料,设计并完成《中国法学家访谈录》课题,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中国法学家访谈录》的最初构思,是笔者在2001年参加中共中央党校中青班学习期间形成的。当时,笔者在听课、学习、讨论之余,经常坐在党校的图书馆里,翻阅革命根据地以及新中国初期的各种文献资料(顺便说一句,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保存的这方面的资料,是全中国各大图书馆中最为齐全的),对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以及20世纪50、60年代的活动,和当时的一批风云人物、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能够把这些事件、人物以及作品等原原本本地写出来,让后人对此有一个比较真实的认识、理解和把握。但是,由于从事这一访谈、研究和写作工作需要较多的经费投入,当时尚无此条件,故此事就拖了下来,未能及时开展。

延至2007年10月,一方面,许多著名的法学家,如周枬、王铁崖、倪征、李浩培、谢怀栻、高格、徐轶民等相继去世,使得开展这项工作更为紧迫:如果我们这项工作再不做,这些作为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史的“活的历史”的当事人,就会越来越少;另一方面,此时,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科,被教育部批准为国家

^① 笔者对历史研究方法的这种分类,当然是出于分析和说明问题的方便,同时,比较的方法、训诂的方法等,在历史研究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在历史研究中,同时使用其中几种或者全部方法的学者和作品也很多。笔者的观点是,只要有可能,在历史研究中,使用的方法愈多,研究成果就会愈加丰硕。

级重点学科,获得了比较充足的经费资助。这样,笔者的上述构想才得以在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中立项,争取到了外出访谈调研必需的课题经费。当一个多年的愿望得以实现之时,笔者真的是非常高兴!

本书原来设想是分为六卷:第一卷,采访的主要是1935年之前出生的法学家,因为这个年龄段的法学家基本上是在1957年之前大学毕业,他们都亲身经历或接触过20世纪50年代中国所发生的影响中国法律和法学发展的事件、人物和文献,甚至许多都是当时“左”的思潮、运动的受害者,身心俱受到很大伤害。正因为如此,有些法学家在回忆时语气、用词比较尖锐、愤懑,有些情绪化。此点,恳望读者诸君予以理解和谅解,毕竟本书是一本历史的著作。第二卷,主要访谈1936年至1948年出生的法学家,这批法学家亲身经历了1966年至1976年间的“文化大革命”,对此前后发生的影响中国法律和法学发展的事情感受比较深,相当一部分人也是这场“大革命”的受害者,他们所叙述的内容,最具真实性,也最权威。受第一卷篇幅的限制,有一部分1935年之前出生的法学家,我们也放在第二卷之中。第三、第四、第五卷,主要访谈1949年至1960年期间出生的法学家,这批法学家人数众多,是现在最为活跃的群体,也是当前中国法律和法学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在学术上,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是与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法治大发展同步成长起来的法学家。第六卷主要访谈1960年之后出生的法学家,在他们这一年龄段的人中间,也已经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法学工作者。

在后来的实际采访中,我们访谈的1949年至1960年期间(后来还包括了1960年之后)出生的法学家,人数大大超出了我们原来的计划,因采访内容的丰富而增加的字数也无法在第三至第五卷这三卷中所容纳,从而不得不又增加了四卷,即第六至第九卷(原计划的第六卷变为第十卷)。由于这一原因,本书就从原来计划的六卷,变成了目前的十卷。此点,也请广大读者理解和谅解。基于此,目前的第三、第四卷共收录了109名(第三卷54名、第四卷55名)法学家,本来想法是拟收录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前半叶出生的法学家(本书的排列都是按照出生年月的先后),但由于在第一、第二卷访谈录中,因种种原因遗漏了一部分学者,所以这一次将这部分学者也全部补充收录进来,如第三卷前面所列的李静堂、蒋碧昆、游绍尹、张梦梅、谷春德、冯卓慧、乔伟等(其中,也有个别法学家已经过世,如乔伟等)。

参加本书访谈、写作的是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专业2006级之后入学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他们虽然还很年轻,但经过本专业多项省部级课题的调研和写作锻炼,在科研方面已经比较成熟了。由于在每一篇访谈文章的末尾都注明

了作者名字,所以在扉页和前言中就不再一一列出每位作者的名字了。尽管如此,李明倩、张伟、王海军等名字我还是要特别地提及。他们是本书访谈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联系人,协助笔者做了许多涉及全书成稿事务的工作。虽然他们还很年轻,但工作起来非常投入、充满激情, also 具有很强的组织和协调能力。由于本书涉及的内容比较繁杂,历史头绪比较多,加上都是回忆类文章,记录过程中可能出现一些不正确或错误之处,谨希望各位被采访者以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法学家访谈录》属于现、当代人写现、当代事,编写这种作品,如上所述,既有有利的方面,也存在着许多困难和缺陷。笔者曾在《中国法学史》第四卷(即将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序中说过:“现代法律人写现代法学史,好处当然是有的,那就是对绝大多数法律事件、法学成果、讨论争鸣、法律人物都是熟悉的,或亲身经历过的,甚或是直接参与者和当事人。因此,写起来当然可以非常真实,非常细致,文献资料也容易收集。但现代法律人写现代法学史的弊端也是明显的。一方面,由于作者是这一段历史的见证人,甚至是当事人,因此,作者就不能做到百分之百地纯粹客观描述,而一定会加入自己的见解和体会,甚至是各种情绪。另一方面,由于被描述的学者都还健在,故考虑到各种人际关系,作者在阐述这一段历史时就会有所顾忌,对许多人和事常常不得不做一些‘技术处理’,无法保证其描述的客观公正。但是,对现代中国的法学发展史进行研究,又是笔者兴趣之所在,放弃这种兴趣我自认为生活将变得毫无意义。因此,笔者决定不去考虑上述两个方面的弊端,以自己的学术良心为准则,无所顾忌地、客观公正地对现代中国这六十余年法学发展的历史作一番系统的梳理,以为学界及其后人留下一点真实的学术积累。”笔者感到这段话对本书的写作也是有指导意义的。

为了忠实地反映每一个被访问者的真实思想和话语,我们在每一篇访谈录成稿之后,都寄给被访问者本人审阅过;有些由于某种原因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也严格按照采访时的录音进行整理,以保证访谈录的原始性和真实性。

在撰写、审阅每一篇访谈录时,笔者以及其他各位作者,经常抑制不住地会叹息、沉思,有时也感到心酸,但更多的时候是感动、钦佩和激动。这些法学家的人生道路和学术事业尽管经历了那么多挫折和坎坷,但他们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爱、对生活的爱始终没有消失,对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中都吃了许多苦,但他们仍然那么开朗、自信、豁达,对过去的那段历史也理解得那么透彻,看得那么平淡,不怨天尤人,不颓废消沉,秉持着我们的党一定能够认识、纠正自

己身上的错误,带领全体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信念,勇敢地活下去,拥抱每一天来自东方的太阳。

我们原来的打算,是在第一、第二卷出版(2010年1月)之后,在2010年年内就把之后的各卷一起推出。但由于本书访谈工作量特别巨大,我们没有能够做到,使编辑出版工作一直拖了下来,至今已过去了两年多。我们一边心里很愧疚,一边不得不承认,有的时候真的是身不由己啊!由此给各位受访者带来的麻烦,务必请诸位专家学者谅解。

本书中许多法学家的访谈,自2009年起,已经有近三十位法学家的访谈为《检察风云》杂志转载刊出。这些法学家的曲折经历和动人事迹,激励着年轻一代的法律人在法治建设的道路上进一步奋勇攀登,从而在司法系统以及整个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良好影响。

《中国法学家访谈录》是上海市人文社科基地华东政法大学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院、国家重点学科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科重点建设项目,本书的调研、写作和出版,得到了这两个建设项目的经费资助。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项目负责人王业龙老师和责任编辑丁传斌、徐音,为本书的编写和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谨表示我们一片诚挚的谢意。

何勤华

于华东政法大学

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院

2012年12月12日

目 录

朱榄叶	(1)
陈治东	(18)
王全弟	(33)
吴汉东	(44)
陈忠林	(52)
怀效锋	(63)
张文显	(70)
姜明安	(81)
王晨光	(99)
李 浩	(110)
张湘兰	(117)
林亚刚	(127)
沈国明	(146)
杨立新	(156)
王 曦	(170)
丁凌华	(188)
陈德敏	(210)
史际春	(220)
段 匡	(227)
曾华群	(240)
朱力宇	(251)
王树义	(260)
刘建宏	(270)
冯亚东	(281)
傅廷中	(294)

余劲松	(306)
林 喆	(317)
柏 桦	(325)
侯国云	(338)
王世洲	(349)
崔卓兰	(366)
朱文奇	(373)
张恒山	(382)
杜志淳	(390)
霍宪丹	(401)
龙宗智	(421)
王亚新	(432)
徐中起	(442)
张 淳	(449)
尹 田	(458)
董保华	(470)
阎 立	(478)
王 军	(496)
陈泽宪	(507)
齐树洁	(517)
於世成	(528)
龚刃韧	(535)
胡鸿高	(550)
卢炯星	(558)
莫洪宪	(570)
陈立虎	(578)
张卫平	(587)
刘士国	(595)
章武生	(609)
朱崇实	(617)



朱榄叶

Zhu Lanye

1950年9月生。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知识产权法学和国际经济法学的教学和研究。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和哈佛大学法学院进修。兼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

员。主要专著、教材有《商标国外注册实用手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国际贸易纠纷案例汇编》《知识产权与国际保护》《WTO争端解决案例概要》等十余部，发表论文《中国在TRIPS协定下的义务评析——评美国在WTO对中国的申诉》等二十余篇。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获得上海市“三八”红旗手、上海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和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担任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WTO研究会副会长。经中国政府推荐，2004年2月17日，被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DSB)批准列入争端解决指示性专家名单。

在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记者在华东政法大学40号楼见到了朱榄叶老师。在这幢拥有百年历史的老楼里，很荣幸能够有机会同朱老师一起畅谈人生，感触颇多。朱老师爽朗的笑声、清晰的思路以及和蔼可亲的态度都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记者(以下简称“记”)：朱老师，很高兴您今天有机会接受我们的采访。听您的口音不像上海人，请问您是哪里人？

朱榄叶(以下简称“朱”)：我口音不像上海人。因为我在黑龙江待的时间太长了，我父亲是部队的，我小学阶段整个都在北方，这可能有关系，但其实我曾祖父辈就是上海人，正宗上海人。

我在农村当农民当了五年多，从1968年到1973年，然后在农场的学校当

了三年老师,什么都教过:数学、政治、外语,逮住什么教什么。当时知青下乡的时候出台了一个政策,具体的年份记不太清楚了,内容是:凡是子女都下乡身边没子女的家庭可以调回一个到身边来。我姐弟都下乡在黑龙江,但当时他们都不在黑龙江了,弟弟当兵去了,姐姐结婚随军了,就我一人还在黑龙江。因此我是76年年底,比大批知青回城早一年回到上海的,就进了工厂工作。



1976年在黑龙江农场,左为朱榄叶

我是76年的12月进的上海工厂,77年就恢复高考了嘛,那年我们考试实际上是11月,报名要早,也就是我进工厂不到一年就恢复高考,就可以报名了。当时我去报名,厂里很多人都不理解,说你好不容易从黑龙江回来了,上了大学不又要分出去吗。很多人都这样想的,但我跟他们说上大学是我从小的梦想,后来遇到了“文化大革命”。当然也不是很遗憾,其实“文化大革命”我都是很积极的,下乡也非常积极的,但是有上大学的机会肯定会想上大学。

其实我在73年曾经有过机会上大学,那个时候靠推荐。说起来也很有意思,当时我们整个农场,那个时候叫团,我们学校去的有八个人。我们学校是上海外语学院附中。原来从来没有被人家发现过,等到后来推荐上大学了,因为正好是73年,自从中国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以后,外语开始被重视了,原来整个农场学校是没有外语课的,突然间发现还有几个外语学校的,团长一句话,“一个也不许走,全部留下当外语老师”。原来从不同生产队被推荐的有四五个,最后只走了一个,漏网没被发现,剩下的全部都被扣下了。我那个时候已经在团部学校当老师,所以肯定走不了,下面一营当老师的没走,三营当老师的也没走成。我那个时候非常不高兴,因为下乡五年以后已经非常想继续去读书

了。其实如果大家都没有上大学,那也可能就一辈子在农村,是做好思想准备一辈子到农村去的,那个时候下乡的人都有这样一种准备的。但时间长了就觉得过去学了那么多,特别是像我们学校,当时应该讲从小学到中学学习成绩一直是最拔尖的那批人在我们学校。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按现在来说就是动摇,就是说不希望在农村里待一辈子,但没办法,也不能逃跑,所以后来回到上海,说有机会凭你自己去考,那肯定就报名了嘛。

记:朱老师,能不能讲一下高考在您心中的印象呢?

朱:那时跟现在不一样,现在读书太费劲了,我当时一天假没请,一直在上班。我们厂当时是一天分三班倒的,早晨六点一直做到下午两点,下午两点做到晚上十点,剩下是夜班的。我那个时候夜班很少,而且都是固定的,早班、晚班倒。大概复习了四五十天吧,就去参加高考了,就考上了。

第一次高考很容易的,只考初中毕业水平。我记得去看《高考1977》,有的人觉得这个电影一般般,我说凡是77、78年那一批人看了是会有感触的,虽然我不是从黑龙江考上去的,但我确实也经历过别人决定你的命运的事情,不是说你表现得好就能走。像前面说的,我是被推荐的,并且一直表现也很好的,那个时候在农村就入党了,什么问题也没有,但就因为我是外语学校的,最后走不了,所以看这个电影还是蛮有感触的。尽管电影里的状况和我们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电影表现的是黑龙江农场的连队,几乎没有本地的,是全部由知青组成的一个连队,在我们那也有,但我所在的那个农场,后来我在的那个连队都是有本地的,情况稍微有些不同。但还是很有感触,如果中央没有决定恢复高考的话,很可能我们这些人就失去上大学的机会,我不能说我一直在农村,因为后来在工厂我是当炊事员的,当了一年多的炊事员。

记:当时报考填写志愿您是什么想法呢?

朱:我觉得我们那代人和现在这代人是很不一样的,比较珍惜上大学这样的机会,因为毕竟当年上海是十一个考生录取一个,现在是十个人里取八个,那是很不一样的,竞争非常激烈。当时高考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实现这个愿望,不可能说永远考下去,因为那个时候是有年龄限制的,一般不超过25岁。我当时已经过28岁了,有很多专业都不让报,虽然理论上是可以的。比方说我原来外语很好,第一志愿想报外语学院,结果我们厂里的人事科打电话一问,人家说过了25岁一律不要,因为他们觉得过了25岁没办法学外语,年龄大了,他们没考虑具体情况。报名时我的选择就是要看外语,因为我相信我的外语会考得比较好。但是我们当时考试外语是加试,不像现在所有的学生都要考外语,当时只是有一些专业要考虑这个成绩,是不算在总成绩里的。后来我选

了第一志愿是复旦国际政治系,第二志愿是海运学院航海系或者远洋系,也是搞外贸的,我还填了外语学院,反正不管你要不要,我不放在第一志愿。

后来我还是考取了第一志愿,应该说当时的考分还是相当高的,是百分制的平均85分,相当于现在高考,像上海的学生满分630分,得考到530、540分的样子。我后来才知道,因为年龄,当时还是差一点点没进。很奇怪,当时老师的想法也不一样。因为恢复高考前,“文化大革命”以前,都是高中生考大学,最多是复习一年再考大学,年龄不会超过20岁。我那个时候已经28岁了,他们就有顾虑。这是后来听我妈妈说的,很巧,我妈妈在党校和我本科班级的辅导员一个班,她曾说起,当初我去的时候老师就觉得这么大年龄的还能读书吗。我要感谢上海市高教局,当时上海下了一个规定。因为当时66、67、68届考大学的挺多的,都过年龄了,我是66届初中,上面还有三届,都过年龄了,因为这些人还挺多考得挺好的,所以最后上海市就有一个命令,教委是按照一定的比例给学校名额,但是如果高分不取,取低分的话,要说出理由,如果把那些高分年龄大的撤掉的话,第二天不给材料了,据说有这么一个规定。那学校也没办法了,也只能从高分里面挑,年龄大的要挑成绩考得好的。当时我们班从上海录取的这几个同学里面,有一个67届的高中生男生,男生他们没有顾虑。我是当时系里拿到材料的上海考生中分数最高的,但是因为我是女的,按老师的理解,这么大岁数了,到时候要结婚生孩子什么的,就觉得是不太可能读书的那种。但是最后没办法嘛,他们还是选了我,后来我就跟他们开玩笑,说幸亏我在大学几年都是我们班成绩第一第二名,所以我为后面的人争了点气,至少他们不会被认为年龄大就读不了书,后来四年里面没什么问题,就读完了。

记:朱老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大学学习过程当中有什么事情是印象最深刻,或者有什么老师或是同学对您的影响最大?

朱:考上大学后,我们都特别珍惜这个机会,不像现在还有什么社团活动,我们那个时候大家就是看书。我们这些同学起了床就开始看书,早锻炼跟现在不一样,我们那个时候要做集体操的,全班同学每天早上集体做操,还点名呢!我记得特别清楚,不上课的时候,我们宿舍里其他同学都是到图书馆或是教室里去占位子看书的,我就跟她们说你们都去图书馆,就我一个人待在宿舍里,所以我四年一个人待在宿舍,等于全部给我腾地方,我就待在宿舍里看书。

大学里有一个老师给我印象最深刻。他现在还很有名,是国际经济法的董世忠教授,现在退休了。他当时是我们的外语老师,尽管他是华政58届毕业的,学的是法律,但是当时“文化大革命”,没有法律课,他就去教外语了。

在78年的夏天,当时我们去了半年,他有一个去联合国读书的机会。当时



1971 年在黑龙江,右一为朱榄叶

董老师已经四十多岁了,还不会法语,联合国下面的那个国际法学院是法语授课,于是董老师就用一个暑假学法语。他家就在复旦的宿舍,但是不回家,在办公室住,天天白天看书,晚上读法语,硬是这样把法语攻下来了,到了日内瓦,学习几年,拿硕士的时候是用法语答辩的。当时我就说这个老师好厉害啊,所以就一直印象非常深。他的这个精神对我们来说还是很有影响的。

应该说大学里的老师中有教得好的,教得不好的,我觉得对我的影响是什么呢,实际上在我从教的过程中可能有一些潜移默化的东西,特别是学好的,自己都感觉不好的绝不会去学。我们当时都是大孩子了,不是小孩子,我上大学都 28 岁了,毕竟 28 岁是成人,有些老师甚至比我们小。有个老师从一进教室就拿着一本讲稿,对着读,普通话也不标准,我开玩笑说我去读都比他读得好。我们不捣乱,也不像现在的学生一样翘课,但确实有在下面看别的书,那是因为讲得不好嘛。我在自己当老师以后,绝对会避免去做我们当时做学生的时候就认为老师不好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不好,或者表达方式不好,或者这样有伤学生的心。去学讲课讲得好的老师,比如说他的综合概述比较好,板书比较好,都会去学,这还是对我们有影响的。

大学里的事情,印象最深的是每年要劳动。一星期不上课去劳动,现在大学本科有军训,我们有劳动,每个学年有一个星期,就是在学校里面劳动,我记得拔草,就是坐在地上,把草坪上的杂草全部撬出来。

我们还集体捉弄过老师,其实那不是真捉弄,是开玩笑。我们每年到放假的时候会开晚会,就自己开,也不像现在这样排节目的,就是在复旦相辉堂前面的大草地上,全班同学像做游戏那样玩。有一次是每个人写个纸条,然后扔在一起去抽,抽到哪个纸条就去做纸条上写的事,比如说:请你唱一首歌。大家都会在上面随便写,什么学狗叫,都有,希望别人抽到。我们有个老师外语不太好,抽到了一张纸条是一道非常简单的英语题,是说:如果有人对你说你长得很漂亮,你怎么回答?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一种不同的思维,中国人肯定会说“哪里,哪里”,外国人肯定是很高兴地说“Thank you”,那个老师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同学就鼓动他说“哪里,哪里”,他不知道,就说“哪里,哪里”,我们就哈哈大笑,说不是的,应该说“谢谢”,就是类似这样的。那个时候每年过暑假前,一年会有一次这样的活动,现在很少有老师和学生一起做联欢会这样的游戏活动,我们那个时候有,当然不是任课老师,是班主任。我们的班主任老师现在是复旦国政系的教授,他好像没到退休年龄,跟我们差不多大,都快退休了,差没两岁,这个还是有印象的。

记:朱老师您觉得你们这代人与现在的大学生相比有什么不同呢?

朱:当然不同。尽管说现在学生的知识面更宽了,眼界也更宽了,会有更多人会去质疑权威观点,可当时我们年龄更大,所以我们对社会的认识比现在的学生更深一点。其实我们在课堂上也会质疑老师,甚至下课后跟老师去争论。我印象里曾经和后来任上海师范大学校长的王邦佐老师在课堂下讨论的时候争论起来,因为我们当时学的是三个世界的理论,第一世界是美苏,后面是第二世界,第三世界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这个理论现在基本上已经不讲,但是当时是通说,用很理论的话来讲,国际政治也应该就是最基本的理论,不能非常实用主义,不能需要什么的时候就怎么样讲。但当时我们还没那么多理论,所以我就开玩笑引用了电影台词说“你不能是墨索里尼总是有理”,王老师一下子愣住了,说这学生怎么会这样说。现在我们知道了,整个形势在变化,法律也随着形势在变迁呢。就是说你的理论是要不断变化,去适应新的国际形势。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谈不出这些理论。

还有一次是上作文课的时候,相当于现在的大学语文,老师是中文系的吴老师,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他说“您”这个字是没有复数形式的。我这人属于心直口快型的,也不管上课老师在讲,一举手就发言,我说:“老师,昨天《人民日报》上登了臧克家的一首长诗,从头到尾都是‘您们’。”他呆了,怎么也不能说《人民日报》是错的吧!现在想想,如果我是老师不会觉得什么,但是有些老师会感觉下不来台。下课以后有的同学就说:“朱榄叶,你怎么这么冲呢?”我说:

“我没觉得我冲啊!”他说:“老师上课,你马上举手,老师还以为什么事呢,结果把你叫起来,还是跟他唱反调。”

记:朱老师,当时您读大学的时候学校课程安排与现在有什么不同吗?

朱: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后来也绝对不会有的。当时我们对课程有着相当大的发言权,因为77级整个的教学方案都没有定。我们上面还有最后一届的工农兵学员,跟我们有半年的重复期。我们是78年2月入学的,他们告诉我们教逻辑课的老师课上得不好,我们就找班长去跟系里反映,不上逻辑课了,编了个理由,说我们这些人都不是高中上来的,大家在各自单位学过列宁的著作等等,反正意思就是说逻辑我们不用学,结果系里面居然同意了,果然我们这个年级就没有学过逻辑。



2010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

另外,我们这个年级很有意思,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决定的。当时我们一个班级41个人,有三个同学像我一样原来是外语学校的,一个广州外语学校的,一个外语学院培训班的,一个华师大培训班的,上海外语学院“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办过一个培训班。就是我们四个人的外语相对来说比别的同学要好不少,一个学期上下来,觉得我们不需要上这些课了,就给我们四个人单独开一个班,一个老师给我们上,也就是说这个教学方法非常灵活。那个老师一看,这几个人可能都是自认为很好,就给我们一个下马威,用联合国的谈判文件作为泛读课的教材,精读课用什么教材我忘记了,反正当时没有正规教材,上课也是属于摸索性的。我记得老师上第一课,就要求把这一课材料里面所有的单词都背出来,我心想,开玩笑啊,裁军谈判会议的材料,里面有很多洲际导弹啊什